

Policy Briefing

政策@萨塞克斯 | 2020年春



Amin Azfar / Shutterstock.com

很多中东的小规模企业家也被吸引前来义乌。因为这座城市的独特的市场结构和采购模式，为他们进入国际商贸降低了门槛。但是，即使是在义乌资历深厚、有着重要地位的商人，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在义乌只是暂时停留，而不是固定居住。这是因为获得长期居留许可比较困难，以及当地可为子女提供的学校教育资源相对匮乏。这也意味着很多掌握重要资本的商人会放弃在义乌的投资，转到欧亚大陆贸易网络的其他枢纽城市寻找投资机会。

简报 2: “新丝绸之路” 的社会基础设施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by Tang Man

作者

绪论

影响义乌外商选择暂时性居留的因素

在义乌居住的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不仅仅是从“问题”国家迁移来的经济移民，更是属于一些更广泛的贸易网络的一部分，这些网络深植于历史上的商贸往来，把欧亚大陆各地区联系在了一起。如此，这些贸易网络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者，也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补充。这些网络的维护和发展取决于三点：保持流通渠道畅通、保证客户定期到访，以及侨汇。

Paul Anderson 博士，
剑桥大学

主要研究结果

1. 居住在义乌的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不仅仅是从“问题”国家迁移来的经济移民，而是属于一些更广泛的贸易网络中的一部分，这些网络把欧亚大陆多个地区联系在了一起
2. 这些贸易网络根植于历史上苏联与中东之间、中国与中东之间的外交、教育和商贸联系
3. 教育移民常常是商贸网络发展的基础。在莫斯科和义乌等商贸城市，学生和商人的生活网络和贸易基础设施总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教育移民不断强化中国与欧亚大陆的市场和技能的贸易联通
4. 义乌特殊的市场结构和采购模式为来自中东的新一代小微企业家们进入国际贸易降低了门槛
5. 信任在这些创业家的联合网络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义乌这样的节点城市，信任产生于当地社区的非正式组织中
6. 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中，无论是资历较深的商人抑或是新来的小微企业家，都认为他们在义乌只是短暂停留，而非永久居住。这是因为他们很难获得长期居留许可，而他们的子女也面临着入学方面的不确定性
7. 对于一些已经掌握了重要资本资源的商人来说，由于这样的不确定性，他们已经不太愿意在义乌或中国投资，而是转向欧亚大陆贸易网络的其他节点城市寻求投资机会



研究背景

苏联与中东之间商贸联系在中国的历史继承

浙江省处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活跃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发展为一个为国际商人提供小商品批发的主要市场。义乌的福田市场在外商之中很有名。福田市场有大约七万家批发商铺，专营中国制造商生产的家用小商品，从袜子、厨具到玩具和化妆品，应有尽有。成千上万的商人从中亚、南亚、俄罗斯、阿拉伯世界以及非洲来到义乌，在这里居住、成立贸易公司，他们主要负责协调货物出口，为来这里采购的国际商人提供后勤保障和通关出关服务。

分析人士把义乌与亚洲、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商品供应路线描述为跨越东西亚之轴心的新“丝绸之路”。他们认为，这条商品供应链的发展是由于9/11政治分水岭之后，阿拉伯商人意识到西方社会再难进行贸易渗透，继而转向东方寻找新的贸易伙伴的结果。

但是，通过义乌的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的活动轨迹，可以看到他们身后一个更为复杂的商业生涯的发展历程。它起始于莫斯科，受苏联和俄罗斯高等教育奖学金的支持，倚靠连接苏联和后苏联地区的流通渠道。

由于苏联、俄罗斯和中国给予中东国家的资助，很多来义乌的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能够开展创业。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间，苏联为了在西亚国家发展客户市场，为叙利亚人和也门人（包括南也门和北也门）提供到苏联的公费留学的机会。这些学生毕业后通常都投身贸易行业，先是在俄罗斯经营，到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前往中国。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正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来到义乌，那时，他们到义乌来采购，为莫斯科和迪拜等地的批发市场供应商品。

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中国的地方政府开始把义乌定位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欧亚大陆的门户，同时扩建福田市场，达到能容纳七万个商铺的规模。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受这片市场的吸引，从莫斯科来到义乌，从一种残留的苏联式的对欧亚大陆的想像，投身到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正不断扩展的跨区域新兴空间的愿景之中。约十年之后，这个关于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新愿景由中国商品和基础设施为纽带，成为习近平治下的“西进”政策 (Li et al. 2016) 以及后来的“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标记。



Ovchinnikova Irina / Shutterstock.com

义乌已经成为围绕中东贸易市场的国际贸易中的主要节点，主要原因是结构因素和政策因素：

市场结构

义乌福田市场是一个固定的商贸市场，有一个稳定的多样化的批发市场结构。它由五个互相连通的超大商场组成，这些商场又分为不同的区，每个区专营不同种类的家用商品以及轻工业所需用的商品。每个市场群批发的商品种类繁多，前来采购的商人通过加工合成赋予产品附加值。他们把在不同市场采购到的商品（比如盒子、绸带、标签、回形针）进行组合，加工为一个合成产品。如此，即使是资本有限的商人也能参与轻工业产品的制造和设计，从而拉动小微企业的发展。

知识产权

由于义乌在知识产权方面体制化程度低、执行力度弱，产品设计很快会被竞争者模仿和创新，这在义乌市场内部以及义乌商品在迪拜的外销市场都很常见。这也刺激了非正式的小微企业的发展。

税收和调节政策

2008年12月，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出口增长缓慢的问题，针对低价商品制定了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这些措施刺激了中东及亚非地区市场对义乌低价小商品的需求。出口奖励措施的出台是为了让中国制造商品在亚洲市场建立起优势地位，并促使外销市场（诸如叙利亚阿勒颇的Suwaiqa批发市场、迪拜的Dragon市场等）的进口商们采取更积极的定价策略，例如使外销到中东市场的中国商品的定价与在中国市场的定价持平。

2014年11月，义乌市场管理方出台了一套简化的税收制度，并迅速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一系列试点研究中推广开来。这套新的制度简化了税收申报、降低了增值税发票要求，使义乌的外商所采购的商品等同于“旅游购物”商品，其目的是降低市场进入的门槛，以吸引自中东前来义乌的初次创业的小微企业家们以更小的立方米单位采购货物，而不是用集装箱。

信任和社区组织

“社区组织”指的是坐落在商贸公司建筑群里的餐厅、咖啡馆等，它们通过调节信任和信誉，对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在义乌的贸易网络的有效运作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组织非正式的离散移民协会和聚会，商人得以互通彼此的信誉程度，从而规避不好的行为，并建立起解决贸易纠纷的非正式机制。因此，信任不仅仅是嵌于共同的亲属关系或族群认同，而是通过在“社区的组织”“面对面的交流，不断地被重塑。

居留、教育和文化公民

由于难以取得永久居留证以及延签方面的困难，再加上有限的获得学校教育的机会，即使是在义乌资历最深的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也把义乌看作暂时的居住点。这就降低了他们对义乌工商业的投资热情，也阻碍了文化组织的形成。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停留是短暂的，所以他们积极地在前苏联地区以及其他移民区域如海湾地区的贸易节点城市维持社会网络和商贸网络，最近，他们的目标还包括土耳其。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一些替代性贸易节点（比如伊斯坦布尔）进行投资。自从2002年正义和发展党上任以来，伊斯坦布尔就把自己定位为一种文化伊斯兰背景下的欧亚大陆的连接点。尽管一些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事实上已经与中国人通婚，并吸引了中国官媒的关注和正面报道，但是，相较于跨国婚姻和文化身份表达的吸引，很多商人更愿意把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作为投资备选。这说明，从某种程度上讲，义乌作为国际商贸城的定位取决于它与欧亚大陆商贸网络中其他枢纽城市的竞争关系。



结论

- 1. 移民网络是影响国际商贸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居住在义乌的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不仅仅是从“问题”国家迁移来的经济移民，而是属于一些更广泛的贸易网络中的一部分，这些网络把欧亚大陆各地区联系在了一起。尽管他们的祖国在欧亚地缘政治中处于边缘地位，但他们通过在欧亚大陆各节点城市之间的流动、做代理商等逐渐发展起来。这些贸易网络深植于历史上的商贸往来，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社会文化基础设施。它们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者，也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补充。这些网络的维护和发展取决于三点：保持流通渠道畅通、保证欧亚市场客户的定期到访，以及侨汇。
- 2. 非正式组织有助于增进贸易网络中的信任。**信任在这些贸易网络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义乌这样的枢纽城市，信任常常产生于当地社区的非正式组织中。这些非正式组织包括餐厅、文化组织等。它们通常并不是国家监管的正式组织机构，但却是组成贸易网络的社会基础设施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的重要作用，才能建立和谐的商贸关系。
- 3. 不利的居留政策和有限的教育资源阻碍了外商在义乌的社会投资。**从整体上看，在义乌的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群体内部也有不同层级的划分，这些层级是非正式的。一些商人因为资历更深、地位更稳固而作为“社区的支柱”，而另一些新到义乌发展的商人，会依附这些业已建立的网络，并尽力融入进去。但是，即使是在义乌待了十几年的“社区支柱”，仍然认为自己在义乌只是暂时停留，而不是永久定居，这是由于他们无法获得长期居留许可，而他们的子女也面临着入学方面的不确定性。

- 4. 中国面临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竞争格局。**尽管很多叙利亚商人和也门商人在义乌发现了重要的商机，也掌握了重要的资本资源，他们仍觉得在中国国内投资很困难。这意味着他们只能转向欧亚大陆贸易网络的其他枢纽城市寻找投资机会。
- 5. 社会政策杠杆能够对商贸领域的人文基础设施形成支撑作用。**在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竞争格局中，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核心，而且很有可能会继续面临地缘政治下的多方竞争格局。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分析大都关注围绕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分配问题，以及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基础的变化，但是，人际网络和技能的分布也会受移民政策、文化组织和教育移民的影响。技术人际网络的分配将在塑造跨欧亚大陆互联互通新形式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但又相对低调的作用。这些人际网络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多个杠杆因素，包括关于市场采购体系的规定、移民政策、文化组织以及教育移民政策等。

联系方式

Paul Anderson 博士
剑桥大学
邮箱: Psa27@cam.ac.uk

更多信息和资源

更多关于TRODITIES项目和萨塞克斯亚洲研究中心的信息，参见：<http://www.sussex.ac.uk/global/research/researchprojects/yiwu>

资助基金

本研究由欧洲研究理事会“地平线2020” (H2020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资助 (项目号669 132 - TRODITIES, Yiwu Trust, Global Trade).